

中国農民工の消費選択行動に関する研究

孙 凤
王 沙
李 海 峰

内容摘要

农民工家庭特有的迁移模式使其消费同时面临跨时选择与跨地选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文利用2011年国家卫计委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视角考察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对不同迁移模式的家庭在消费、储蓄和汇款选择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影响农民工家庭资源配置的动机和因素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农民工 跨时消费选择 跨地消费选择 家庭迁移模式 家庭生命周期

Abstract:

Because the most migrant worker's family members distribute the urban and rural, they have to face with intertemporal and regional consumption choices. How to make the decision that makes up their strategies of allocating families' resour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eparation patterns on the expenditure, saving and remittance across the migrant worker's family life cycle. The data are used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monitoring survey in 2011 that was conducted by China's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Some findings are inferred from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 cross-regional consumption; remittance; family life cycle

一、引言

2016年中国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监测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有2.54亿人，其中87%为农民工。农民工不仅创造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也是拉动中国消费需求的巨大力量。长期以来，农民工的消费问题并未受到重视，一是农民工长期以来的候鸟式消费模式，以及节俭的生活习惯，被看作是消费欲望低和消费能力不足而不被关注；二是农民工长期被看作是生产者而非消费者，更多是与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而不被关注。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工的

城镇化, 考察农民工的消费选择有助于了解其生存发展状况和对未来的预期, 对于促进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民工在消费选择上具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跨时选择, 即农民工的收入是在当前消费还是延迟到未来消费, 这是作为一般消费者通常所面临的选择; 其二是城乡选择, 即农民工的收入是用于城市消费还是用于农村消费, 这是作为农民工所特有的选择。研究农民工的消费选择问题需要将跨时选择与城乡选择行为相结合, 这无疑使得农民工的消费选择研究更加复杂。在影响农民工消费选择的因素上, 不同于传统消费选择理论中的收入决定论, 还包含许多社会和心理因素, 如家庭的团聚和分离, 就业的稳定性, 社会保障的建立与完善, 身份认同等。

本研究运用2011年国家卫计委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考察农民工的家庭迁移模式对跨时消费选择和城乡消费选择的影响。文章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相关研究综述, 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框架; 二是介绍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数据来源以及变量的选择; 三是建构定量分析模型, 并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与解释; 四是提出本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相关研究综述

(一) 消费的跨时选择: 当前消费还是未来消费

消费的跨时选择, 是指居民个人或家庭在消费时机上的安排, 做出现期消费、延期消费或提前消费的选择, 最终体现在消费与储蓄的关系上。经济学家对跨时选择的关注由来已久。亚当斯密认为, 消费在不同时间上的分配不仅影响了一个人的健康、财富和快乐, 还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苏格兰经济学家Jone Rae (1834) 指出跨时选择的决定因素是“积累的有效愿望”——一种心理因素, 该因素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储蓄和投资水平。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跨时消费选择理论有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 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 利兰德的预防性储蓄理论, 泰勒的行为生命周期和心理帐户理论。这些理论假说的核心是探讨影响消费者选择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的决定因素, 其中包括当期收入水平, 过往的消费

习惯和周围消费水准的影响，对未来收入和风险的预期，以及能够延迟消费的自我控制能力。

针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消费跨时选择行为，学术界展开了较多的实证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农民工在跨时选择上，有偏好储蓄，即未来消费的倾向。吴兴陆（2005）的研究显示，由于农民工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获得较少社会保障，表现出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消费行为特征。王曼（2005）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流入地一般具有千方百计降低生活消费和迁移流动成本，力行求廉求实的理性消费观念。杭斌（2009）认为由于农村流动人口在收入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而具有更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储蓄的主要目的就是积攒钱财，寄回家盖房子、结婚、供养孩子上学。

然而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有偏好当前消费的倾向。孙凤等（2013）的研究显示，农民工的消费能力与实际收入有着密切联系，当前消费随着农民工当期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潘毅等（2008）的研究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已经超越了经济层面，不再只是为了实现赚钱养家的经济目的，更大的诉求在于摆脱农村人的人生轨迹，因而更倾向于接受城市的消费价值观念和消费方式，对城市生活方式表现出高度的认同，消费成为建构身份认同的首要场域（谭深，2004；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已经成为了积极的消费主体，在消费上不再节衣缩食，甚至有些已经成为了赚多少、花多少的“月光族”（余晓敏等，2008；潘毅等，2008；卢秉利，2007）。

（二）消费的空间选择：流入地消费还是流出地消费

农民工在流入地务工，但并未与流出地脱离关系，那里有妻子儿女和父老乡亲，因此获得收入后需要通过汇款在流出地和流入地进行资源配置和消费选择。这里的汇款，并非仅指通过邮局或银行进行的汇款，而是指流动人口从流入地向流出地的资源转移。其中除正规途径的汇款之外，还包括托人交给家乡亲人的款项和物品、为老家家庭支付的各种款项、为家乡公益事业捐赠的财物等。

针对移民汇款的决定因素，学术界将其归纳为利他、利己、交换、偿债、共同保险等（周敏等，2012）。首先，从利他主义理论看来，移民的汇款行为

主要缘于他们对老家其他家庭成员经济状况和消费需求的关心。由于移民外出往往能够比在家乡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他们有强烈的自觉意愿通过汇款来提升家乡家庭的生活条件（Lucas & Stark, 1985; Funkhouser, 1995; Bracking, 2003）。第二，从利己主义理论来看，移民的汇款行为完全出于自私的目的，移民汇款要么是为了继承家庭财产，要么为了在家乡投资并确保其资产得到妥善的保护，为返乡定居做准备，这种投资可以用于固定资产，如土地、牲畜、房屋等，也可以是公共资产，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威信和政治影响力（Ahlburg, 1988; Blue, 2004; Rapoport, 2005; Schrieder, 2000; Jorge, 1996）。第三，从交换理论来看，移民汇款是为其资产或亲属得到照看所支付的费用，因此移民单独外出往往拥有较高的汇款倾向（Cox, 1987; Rapoport, 2005; 明娟, 2011a）。第四，从偿债理论来看，移民的老家曾为其人力资本积累和迁移承担了成本，由此建立起一种隐性合约，移民以汇款的形式予以回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汇款量也越大（Poirine, 1997; Michael, 1979; Hoddinott, 1992）。第五，从共同保险理论来看，汇款具有规避风险和联合应对风险的功能，外出移民的汇款可以帮助老家家庭应对可能的收入困境。同时，移民当其收入受到冲击时可以从老家家庭获得资金支持或返回老家生活以渡过危机。因此，移民在工作地收入不确定性越高，其汇款也相应增加（Amuedo-Dorantes, 2006）。

随着中国农民工大规模地涌向城市，汇款背后的动机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农民工汇款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利他性动机。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多种动机可能共存，罗芳（2007）的实证分析认为，家庭收入水平、外出打工时间、配偶是否留在家乡、返乡养老意愿、家乡的房产以及失业时农村家庭的经济援助等对汇款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既有利他动机，又有利己动机。胡枫等（2008）发现在中国农村，汇款接受者大部分为60岁以上与幼年孙辈同住的长者，这种基于幼年子女照看的农民工汇款有明显的交换动机。明娟（2011）的实证分析发现，夫妻共同外出、子女在原籍读书、较强的回流愿望都会带来更高的汇款，农民工汇款更可能是交换动机、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共同作用下的行为。另外，也有部分研究

支持了农民工汇款的偿债动机解释，对于从老家曾获得迁移资金支持的农民工、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对家庭养育之恩感受更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汇款并且汇款量较高（Qian Cai, 2003; 胡枫等, 2008; 李妍妍, 2006）。

（三）农民工的家庭迁移模式

在对农民工消费的研究中，家庭人口的重要性被许多研究者所证实，但从农民工与家庭成员实际居住关系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即使有也是简单区分为举家外出和独自外出，而没有考虑家庭分离的不同情境。实际上，农民工家庭的分离情境复杂多样，根据流动家庭的各类成员组成情况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如单身子女独自外出（或与兄弟姐妹外出），与父母分居；夫妻一方外出，与配偶分居；夫妻外出，与子女分居；夫妻携子女外出，与父母分居等（李强, 1996; 洪小良, 2007; 张文娟, 2009）

农民工家庭分离状态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迁移距离的远近、外出时间的长短、工作的稳定性、收入的高低、家庭成员的构成（段成荣等, 2008; 杜鹏等, 2010），然而，总体来看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国内外学者对家庭生命周期模式具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一般都以子女的发展成熟程度为主要依据，选取家庭中重要的事件，划分为家庭形成期（新婚夫妇）、家庭扩展期（生育子女期）、幼儿期、学龄期、青少年教育期、家庭收缩期（子女相继离家期）、中年父母期（空巢或退休期）、家庭解体期（杜鹏, 1990; 刘艳彬, 2007）。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外出务工往往是整个家庭的决策，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家庭，家庭分离造成的影响、家庭团聚实现的条件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农民工家庭分离情境的形成势必与家庭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王志理和王如松（2011）运用国家计生委2010年下半年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在30-40岁期间“带眷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岁数，可见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家庭在携眷问题上的考虑存在差异。农民工即使最初只能一个人外出流动，也会尽力借自身以及外部的力量不断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福利状况，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团聚，最终形成流动的家庭（杜鹏等, 2010）。

三、研究假设、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储蓄和汇款是三种不可分割的消费选择行为,任何一种类型的农民工家庭随时都可能面对着这样一个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配置问题。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是,由于农民工在迁移中,家庭类型复杂多样,因此在消费选择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受家庭迁移模式的影响,具有独特的资源配置逻辑。

(一) 研究假设

假设1:农民工选择当前消费还是未来消费受家庭迁移模式的影响,团聚家庭较分离家庭具有较高的当期消费倾向。

假设2:农民工通过汇款调整本地消费和老家的消费,这种调整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存在差异,汇款动机随家庭迁移模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假设3: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跨时消费选择和跨地消费选择在显著性差异。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国家卫计委2011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根据分层比例抽样原则,在6个城市(北京、苏州、郑州、中山、成都、韩城)开展了总样本规模为8200个的流动人口调查,样本分布为:北京、郑州、成都各2000份,苏州、中山各1000份,韩城200份。通过将调查数据中的户籍、家庭成员居住情况、消费选择等关键变量进行有效性匹配,最终形成外地户口农民工数据有效样本6976个。

(三) 变量选择

1、因变量

1) 消费倾向。本文将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倾向作为跨时消费选择的代理变量。消费倾向指的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率,该比率越高代表越倾向于当前消费。一个家庭当前拿出收入的多大部分来消费,这是体现跨时消费选择的关键。绝对收入理论认为消费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然而一些研究发现,消费倾向随收入递减并不具有普遍适用型(世界银行,1997;吉利斯等,1996),如美国的消费倾向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较高社会阶层比较低

社会阶层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因此除收入之外，制度、种族、教育、宗教、习俗等都可能对消费倾向造成影响。消费倾向是个既能够充分体现跨时消费选择，又能反映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变量。

2) 汇款倾向。本文将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作为跨地消费选择的代理变量。汇款倾向是指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以汇款的形式转移给老家的比率，即汇款金额占收入的比例，反映农民工家庭最终拿出多大部分的收入给老家。汇款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必须作出的选择行为，存在着是否发生问题。因此在农民工家庭之间，同时存在汇款意愿和汇款多少的选择问题。

由于消费倾向和汇款倾向是一个比率的概念，从理论上取值范围为0-1，但实际上由于存在借贷消费、大额汇款等因素，个别家庭取值可能大于1。为方便计算，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消费倾向乘以100。

具体操作化如下：(1) 农民工家庭在务工地的消费倾向，为年支出与年收入的比率*100；(2) 农民工家庭汇款意愿，即汇款与没有汇款的比率；(3) 农民工家庭的汇款倾向，即年汇款额与年收入的比率*100。

表1 因变量的分布

因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消费倾向*100	6976	53.18	23.51	1.04	200.00
储蓄倾向*100	5139	11.81	12.72	0.02	138.89
	样本数	发生样本数		发生比例	
汇款意愿	6976	5139		73.67%	

2、自变量：家庭迁移模式

家庭迁移模式是农民工家庭主要成员居住关系与家庭所处阶段的综合反映。在借鉴以往学者关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基础上，本研究以家庭最小子女的年龄与教育程度为边界，通过区分家庭分离与团聚的状态，将流动人口家庭迁移模式划分如表2，探讨家庭迁移模式对消费选择的影响机制及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中的体现，自变量的分布如表2。

表2 自变量的分布

家庭迁移模式	全体样本		新生代		老生代	
	样本数	百分比	样本数	百分比	样本数	百分比
形成期分离家庭	92	1.32	59	1.95	33	0.86
形成期团聚家庭	220	3.15	165	5.45	55	1.43
生育期分离家庭	444	6.36	323	10.67	121	3.15
生育期团聚家庭	575	8.24	417	13.78	158	4.11
学龄前分离家庭	296	4.24	190	6.28	106	2.76
学龄前团聚家庭	369	5.29	215	7.11	154	4.01
学龄期分离家庭	786	11.27	126	4.16	660	17.18
学龄期团聚家庭	965	13.83	125	4.13	840	21.87
青少年教育期分离家庭	527	7.55	0	0	527	13.72
青少年教育期团聚家庭	277	3.97	0	0	277	7.21
成年期分离家庭	604	8.66	0	0	604	15.73
成年期团聚家庭	249	3.57	0	0	249	6.48
单身子女外出型	1463	20.97	1406	46.46	57	1.48

表2作为家庭迁移的主要模式：其一，综合考虑了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分离状态，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中，又综合考虑了夫妇和子女年龄、子女教育等因素。其二，不同家庭可能因为处于同一周期不同状态或处于同一状态不同周期而被归于不同的迁移类型。其三，在对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界定中，本文仅考虑与农民工关系最紧密的核心家庭成员的居住关系，家庭分离意味着农民工与核心家庭的重要成员不同住，家庭团聚意味着农民工与核心家庭的重要成员同住。其四，考虑到农村家庭可能的多子状况，本文以最小孩子的教育和年龄来划分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

表2数据显示，农民工家庭分离存在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在青少年教育期、成年期，分离家庭的数量为不分离的2倍有余；在生育期、学龄前和学龄期，团聚家庭数量比分离家庭略多一些；而在形成期，家庭团聚的比例高出许多。同时，农民工家庭迁移模式具有代际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比例较高的依次是单身子女外出型、生育期团聚家庭、生育期分离家庭；在老生代农民工家庭中，比例较高依次是在学龄期团聚家庭、学龄期分离家庭、成年期分离家庭。

3、控制变量

除了家庭迁移模式外，决定农民工消费的主要因素还可以分为三类：户主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老家所在地等；农民工务工因素，包括打工年限、收入、就业类型、迁移成本等；此外，参考群体、城市归属感等都对进城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有显著影响。

在控制变量中，首先，除纳入一般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老家所在地、代际之外，加入了“养老打算”的变量，用于测量农民工在城市的归属感。第二，将“是否跨省”作为测量农民工家庭流动距离或迁移成本的指标；第三，对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使得样本更加接近标准正态分布；将农民工划分为未就业、受雇、自雇三种，反映就业的风险程度。第四，在保障因素中，对农民工在本地是否购买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在近三年是否有换工作经历来测量其收入的风险与预防性储蓄的动机。

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占比超过40%，而相同受教育程度中老年代不足20%；老年代农民工已经确定未来回老家养老占比38.5%，而新生代农民工没想好的比例占到半数；在就业类型上，新生代农民工有2/3是受雇于企业或他人，老年代受雇与自雇的均为40%以上；大部分农民工近三年都有换工作经历；老年代在本地务工时长平均为新生代的2倍。

四、模型建构

(一) 消费倾向模型

根据选定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建立多元分析模型，由于消费倾向是个连续型变量，且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OLS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如下：

$$E(Y|X_i) = \alpha + \beta_i X_i$$

其中， Y 为被解释变量， X_i 为解释变量， α 为常数项， β_i 为待估参数。本文依次对影响消费选择的各个自变量采用嵌套模式，建立三个相关模型（表3）：

模型1：此模型只加入农民工家庭户主的个人特征因素，观察农民工家庭消费倾向随户主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老家所在地、代际、养老打算的变化

情况。

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增加了与户主打工有关的因素，观察农民工家庭消费倾向受本地务工年限、收入、流动距离、就业类型等的关系。相对于模型1，该模型的解释力度明显提升。

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增加了家庭迁移模式，包括对消费倾向可能造成影响的所有变量，并分别对新生代样本和老一代样本分别建立模型。相对于模型2，模型3的解释力进一步提高。根据模型3，并与模型2和模型1的比较，得到如下发现：

1、**人口学因素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模型1和模型2数据显示：其一，年龄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为负，即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民工收入中用于当前消费的比例在下降，消费选择更倾向于未来消费，但从纳入家庭分离因素的模型3来看，年龄对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说明家庭迁移模式对消费选择的影响更大。其二，教育程度与消费倾向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当前消费，这种倾向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尤为明显，户主为高中或中专学历比小学及以下的家庭消费倾向（消费占收入比）高出9.13%，大学及以上的则高出15.58%。其三，流出地对消费倾向有一定的影响，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消费倾向显著高于中、西部，即来自发达地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当前消费。养老打算对于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老一代农民工身上，决定退休后留在城市的农民工比决定回老家养老的农民工倾向于多拿出2.4%的收入进行消费。

2、**迁移距离与年限及打工因素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3显示：其一，来本地年限与家庭消费倾向有着正相关关系，即在本地年限越长，越倾向于选择当前消费，农民工来本地年限每增加一年，消费与收入比增加0.5%左右。其二，流动距离显著影响消费倾向，省内流动的消费倾向比跨省流动高出1.8%左右。其三，受雇于他人或企业，消费倾向比自雇、未就业的要小8.5%左右，可能的原因是有些农民工由雇主方承担了吃、住等花费等，而减少了支出，增加了储蓄。其四，不同的城市的消费倾向存在不一致，由高到低的大体顺序为：中山、北京、成都、郑州、苏州、韩城，这可能与城市的产业类型、

生活成本也有较大关系。另外，由于因变量消费倾向是以收入为分母，这里仅将收入变量作为控制因素，不进行解释。

3、家庭团聚和分离的影响。其一，总体来看，除单身子女外出型与形成期团聚家庭之外，所有分离家庭在本地的消费倾向都比对应类型的团聚家庭明显要低，即团聚家庭更偏好于当前消费，尤其是对生育期、学龄期和青少年教育期家庭尤为明显，假设1基本得到验证。

其二，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因素影响。独自外出的农民工中，单身的比有配偶的在消费倾向上高12.89%；对于有配偶的农民工，与配偶团聚家庭的消费倾向比分离的高11.38%；对于子女处于学龄幼儿期的家庭，与年幼子女团聚的比分离的消费倾向要高15.95%；对于子女处于小学教育期的家庭，与子女团聚的比分离的消费倾向要低20.88%。假设1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得到验证。

其三，观察老一代农民工的家庭因素影响。对于子女处于学龄前幼儿期、学龄幼儿期的农民工家庭，团聚家庭比分离家庭的消费倾向分别高12.73%、8.04%；对于处于小学教育期和青少年教育期的农民工家庭，团聚家庭比分离家庭的消费倾向高10.60%和13.67%；然而，老一代农民工处于子女成年期的家庭，分离与团聚的消费倾向差异不大。假设1在老一代农民工的两个生命周期阶段得到了验证。比较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消费倾向，假设3也得到部分验证。

表3 影响消费倾向的多元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	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	消费倾向
	ModelA1	ModelA2	ModelA3 新生代	ModelA3 老生代
	(β 值)	(β 值)	(β 值)	(β 值)
性别(男)	1.237**			
年龄	-0.893***	-0.420*	-0.210	-0.14
年龄平方	0.011***	0.007**	0.001	0.002
教育(小学及以下)				
初中	1.013	1.001	1.010	1.002
高中或中专	1.824*	4.344***	9.127***	2.593**
大学及以上	6.282***	10.77***	15.58***	8.986***

老家所在地 (东部)					
	中部	-1.756**	-0.669**	-0.414*	-0.391*
	西部	-3.481***	-0.809**	-0.926*	-0.178*
代际 (老生代)		0.859***	0.656**		
养老打算 (回老家)					
	没想好		1.515**	1.103	1.274*
	留在城市	1.689**	2.486***	1.204	2.432***
来本地年限			0.590***	0.538***	0.461***
收入对数			-16.26***	-20.26***	-16.72***
流动距离 (跨省)			2.271***	1.848**	1.611**
就业类型 (未就业)					
	受雇		-12.02***	-9.085***	-8.410***
	自雇		-2.147**	-1.03	-1.09
务工城市 (北京)					
	苏州		-4.160***	-3.511**	-3.568***
	郑州		-2.245**	-1.18	-3.014**
	中山		4.037***	4.512***	3.072**
	成都		-	-	-
	韩城		-3.298*	-2.87	-7.815***
	家庭规模			1.089***	1.011
家庭迁移模式 (形成期分离家庭)					
	形成期团聚家庭			11.38***	2.130
	学前幼儿期分离家庭			-4.487**	-4.775**
	学前幼儿期团聚家庭			11.88***	7.957**
	学龄幼儿期分离家庭			-3.838*	-1.24*
	学龄幼儿期团聚家庭			12.11***	6.802**
	小学教育期分离家庭			-6.818**	-5.903**
	小学教育期团聚家庭			14.06***	4.7**
	青少年期分离家庭			—	-7.587**
	青少年期团聚家庭			—	6.085**
	成年期分离家庭			—	-8.123*
	成年期团聚家庭			—	-6.25**
	单身子女外出型			12.897***	
常数项		66.47***	219.0***	235.1***	233.0***
样本数		6,976	6,976	3,026	3,841
R平方		0.014	0.162	0.212	0.207

注：1.显著性水平：*** p<0.01, ** p<0.05, * p<0.1, 仅显示置信度水平在90%以上的系数。

2.括号内为参照组。

(二) 汇款意愿与汇款倾向模型

汇款倾向虽与消费倾向同为连续变量，在估算方法上却不能利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因为样本中既包含有汇款者，也包含无汇款者。对于占样本一定比例的无汇款者来说，其汇款额为0，导致被解释变量在0处截断。截断问题被很多移民汇款的实证研究所忽略，使得对被解释变量的估计有偏。有些学者通过删除汇款为0的样本来试图避免，但往往估计结果与实际并不一致。事实上，在研究解释变量对汇款倾向的影响时，不应该忽略没有汇款行为的那部分样本。针对截断问题，TOBIT模型能够进行较好地处理。模型如下：

$$E(Y|X_i) = E(Y^* > 0 | X_i) = \alpha + \beta_i X_i + \epsilon$$

其中， Y^* 为汇款倾向（汇款大于0的样本）， X_i 为解释变量， α 为常数项， β 为待估参数， ϵ 为残差项，该方程用于计算给定X条件下，Y的条件均值，前提条件是 $Y^* > 0$ 。当 $Y^* \leq 0$ 时， $E(Y|X_i)$ 为0。

式中的解释变量既有反映农民工家庭是否汇款的概率，又有影响农民工家庭汇款倾向的因素，且前者对于后者的影响具有修正效应。总体中每个个体的汇款倾向的预测值为：

$$Y_i = \alpha + \beta X_i + \sigma \lambda_i, \quad \lambda_i = \frac{\phi\left(\frac{\beta X_i}{\sigma}\right)}{\Phi\left(\frac{\beta X_i}{\sigma}\right)}$$

式中， ϕ 和 Φ 分别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和概率分布函数， λ 体现了TOBIT模型对样本选择偏误的修正。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得到如下发现：

1、影响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的个体影响因素：其一，女性有更高的汇款意愿，但汇款倾向低于男性，可能是收入低于男性的缘故。其二，汇款倾向与年龄的关系存在着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汇款倾向与年龄成正比，而老生代农民工与年龄成反比。其三，教育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汇款倾向成反比关系，与老生代农民工成正比，这表明汇款的偿债动机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得不到证实。其四，来自于西部地区农民工比东部地区的汇款意愿要高，其中新生代高出13.2%，老生代高出16.7%。其五，养老打算对汇款行为有明显的影响，打算回老家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汇款意愿比打算留在城市的家庭的高

26.1%，比老生代高28.0%，在汇款倾向上，打算回老家的也具有更高的体现，农民工汇款的利己动机得到一定验证。

2、影响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的务工因素：其一，来本地年限对老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有明显的负影响，来本地的时间每多一年，汇款意愿减少11%，汇款倾向也减少，体现了农民工汇款的利他动机随着务工年限的增加而减少。但在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汇款倾向上，该解释却不成立。其二，收入对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的影响也并不一致，前者是正向，后者是负向。其三，同样的不一致也体现在流动距离上，省内流动比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家庭在汇款意愿上高出22.2%（新生代）、7.5%（老生代），但在汇款倾向上却低于跨省流动。受雇于企业或其他雇主的农民工家庭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都高于自雇和未就业的。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在不同务工城市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三，与家庭迁移模式相关的因素：其一，分离家庭比团聚家庭具有更高的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独自外出的农民工，单身的比有配偶的汇款意愿和汇款倾向更低。其二，有配偶、幼儿期子女、教育期子女的农民工家庭，与配偶、子女分离的比与配偶团聚的汇款倾向更高；其三，对于子女处于成年期的老生代农民工家庭，分离与团聚造成的汇款差异并不明显。可见从家庭生命周期的趋势来看，分离家庭到子女成年期时汇款意愿和倾向减少，团聚家庭到成年期汇款意愿和倾向有一定的提升，这很可能的解释是，此时步入中老年的务工父母对于基于利他的汇款（如儿女受教育）减少，而基于利己的（如为回家养老做准备）的汇款增加。假设2在此得到证实。

表4 汇款意愿的LOGIT模型与汇款倾向的TOBIT模型

解释变量	新生代		老生代	
	汇款意愿 (Logit)	汇款倾向 (Tobit)	汇款意愿 (Logit)	汇款倾向 (Tobit)
	(odds ratio)	(β 值)	(odds ratio)	(β 值)
性别（男）	1.213**	-0.592*	-0.401	-1.550***
年龄	1.13**	0.565*	1.31***	-0.402*
年龄平方				

教育（小学及以下）					
	初中	0.677**	-1.909**	1.211**	0.182*
	高中或中专	0.621**	-2.308**	1.204**	1.106*
	大学及以上	0.48***	-3.150**	0.786**	2.422**
老家所在地（东部）					
	中部	0.905*	-1.558**	1.042*	-1.548**
	西部	1.132*	-1.095**	1.167**	-0.566**
代际（老生代）					
养老打算（回老家）					
	没想好	-0.123	-0.293*	-0.128	-0.41*
	留在城市	0.739**	-0.349*	0.72**	-0.461*
来本地年限		0.115	0.260**	0.89**	-0.324*
收入对数		1.908***	-4.935***	1.477***	-4.388***
流动距离（跨省）		1.222**	-1.042**	1.075*	-1.729***
就业类型（未就业）					
	受雇	1.608***	2.837***	1.648***	2.664***
	自雇	0.864*	0.565*	1.11*	-0.233*
务工城市（北京）					
	苏州	0.876*	-0.391	0.725*	-1.568*
	郑州	0.553**	-2.590**	0.604**	-0.388
	中山	1.674**	-2.231**	1.392*	-1.753**
	成都	0.713**	-3.511***	0.944	-2.688***
	韩城	1.96***	2.517	4.024***	-0.729
家庭规模		1.138***	0.358**	1.279***	0.389**
家庭迁移模式（形成期分离家庭）					
	形成期团聚家庭	0.41***	-5.638***	0.325*	-6.052***
	学前幼儿期分离家庭	1.44***	0.62**	1.133**	1.572***
	学前幼儿期团聚家庭	0.472***	-7.722***	0.349*	-7.372***
	学龄幼儿期分离家庭	1.363***	1.047***	1.208**	0.175***
	学龄幼儿期团聚家庭	0.44***	-8.368***	0.346***	-8.041***
	小学教育期分离家庭	1.415***	1.907**	1.31***	0.569***
	小学教育期团聚家庭	0.408***	-10.037***	0.281**	-9.253***
	青少年期分离家庭	0.192	0.159	1.396***	1.611***
	青少年期团聚家庭	0.167.	0.121	0.253***	-11.572***
	成年期分离家庭	0.321	0.214	0.412**	-6.493***
	成年期团聚家庭	0.230	-0.293	0.407***	-6.383***
	单身子女外出型	0.83**	-0.964**	0.39***	-4.778***
常数项		61.49	62.61***	62.10	62.40***
样本数		3,026	2,175	3,841	2,889

卡方	297.23***	422.7***	507.48***	508.74***
自由度	29	29	33	33
Pseudo R2	0.083	0.124	0.118	0.108
Tobit模型修正sigma	11.01	11.76***	11.12	11.24***

注：1.显著性水平：*** $p < 0.001$, ** $p < 0.05$, * $p < 0.1$ ，仅显示置信度水平在90%以上的系数。

2.括号内为参照组。

五、发现与建议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农民工家庭分离及其带来的影响引致越来越多的关注。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独特的身份和家庭分离的迁移模式，使得其家庭消费同时面临跨时与跨地的选择，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家庭经济资源配置策略。基于这样的背景和逻辑，本文致力于探索的问题是：农民工家庭迁移的不同情境如何影响其家庭经济资源的配置结构，尤其是如何引致在消费选择策略上的差异。

通过建立在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上的家庭迁移模式的分析发现：家庭分离对农民工家庭消费选择的影响体现在农民工子女成年以前的各个家庭阶段，单身农民工与父母的分离，已婚农民工与配偶、未成年子女的分离使得农民工家庭在本地表现出较低的消费倾向，较高的汇款意愿以及汇款倾向。随着家庭的团聚，消费倾向逐渐提高。不难推断，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家庭在跨时选择上倾向于当前消费，在城乡选择上倾向于城市消费。

家庭分离对农民工家庭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首先，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较强的回老家养老意愿使得农民工家庭在本地消费倾向减少、而汇款倾向较高，汇款是为了目前或未来在老家的消费而做出的转移行为，汇款与储蓄的差异仅在于是当期转移还是未来转移而已，老家家庭对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意味着更多的是责任、负担以及养老归宿，其延期消费更多的是为了在老家的消费，预防老家生活可能面临的风险，而汇款体现的是一种利他动机与利己动机的结合。其次，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伴随家庭人口数增加，其家庭在本地消费也增加，而汇款倾向却减少。在本地购买了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倾向上显著高于没有购买的。据此，我们可

以推测,新生代农民工的跨时消费是基于预防在务工城市未来生活可能面临的风险而做出的延期性消费行为。在新生代农民工眼里,老家家庭除了意味着责任、负担之外,也是共同承担风险的单位,他们的汇款除利他、利己动机之外,也体现了维系与老家家庭的关系的一种共同保险动机。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仅将立足点置于农民工家庭中外出的部分,以外出人员在务工地的消费以及汇款为内容建立起家庭消费选择的结构性框架。基本的一个前提假设在于,对于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农民工来说,其务工收入不仅支撑家庭成员在务工地的生活与消费需求,因务工产生的汇款也是老家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外家庭的消费选择深深地影响着留守家庭的消费策略,后者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地从属于前者。然而,农民工家庭的组成形态和成员关系复杂多样,对于很多农民工家庭来说,留守在农村的成员亦是家庭消费选择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只有将农民工家庭留守部分的消费选择一并纳入视野,才能形成对农民工经济资源配置研究的闭环。事实上,已有多位学者以对汇款的使用为切入点,在农民工家庭留守部分的消费选择问题上做出研究尝试,如Zhu Yu等(2011)研究发现中国外出农民工的汇款主要应用于老家家庭的日常消费领域,而非储蓄或生产性投资。然而,更有力的验证以及对农民工家庭经济资源配置结构的完整刻画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受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课题“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家庭问题研究“(20131089221)以及北京是社科基金课题“符号消费问题研究“(20125040246)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杜鹏. 中国城乡家庭生命周期的初步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1990 (4):24-28.
- 杜鹏, 张文娟. 对中国流动人口“梯次流动”的理论思考. 人口学刊, 2010 (3):25-29.
- 段成荣, 杨炯, 张斐, 卢雪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人口研究, 2008, 32 (6):30-43.
- 杭斌. 习惯形成下的农户缓冲储备行为. 经济研究, 2009 (1):96-105
- 洪小良. 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6):42-50.

胡枫, 史字鹏, 王其文. 中国的农民工汇款是利他的吗? ——基于区间回归模型的分析. 金融研究, 2008 (1):175-190.

吉利斯等. 发展经济学. 黄卫平等, 译. 4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18-31.

李强. 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 浙江学刊, 1996 (1):77-81.

刘艳彬. 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管理科学, 2007, 20 (6):45-53.

李妍妍. 进城务工女性汇款情况研究——以厦门市流动妇女为例. 南方人口, 2006 (4): 56-63.

罗芳. 外来农民工家乡汇款的影响因素及动机分析——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例.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S1):49-56.

卢秉利, 匡立波. 农民工: 亦工亦农的新阶层. 社会主义研究, 2007 (1):83-85.

明娟, 张建武. 回流意愿、迁移成本与农民工汇款——一个区间回归模型分析. 南方人口, 2011, 26 (1):48-55.

潘毅, 陈敬慈. 阶级话语的消逝. 开放时代, 2008 (5):53-60.

潘洪涛, 陆林. 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透视, 2008 (9):31-32.

孙凤, 丁文斌. 中国消费者的头脑账户分析. 统计研究, 2005 (2):42-46.

孙凤. 预防性储蓄理论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 南开经济研究, 2001 (1):54-58.

孙凤, 王少国. 农民工消费能力研究. 学习与探索, 2013 (4): 50-55.

谭深. 家庭策略, 还是个人自主? ——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 浙江学刊, 2004 (5):210-214.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 2001 (3):63-76.

王曼. 北京农民工消费与储蓄选择——基于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6):76-80.

王志理, 王如松. 中国流动人口带眷系数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与经济, 2011 (6):9-16.

吴兴陆. 农民工定居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人口与经济, 2005 (1): 5-10.

严超君. 长三角城市农民工消费方式的转型——对长三角江苏八城市农民工消费的调查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07 (3): 224-230.

余晓敏, 潘毅.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 社会学研究, 2008:143-171.

翟振武, 段成荣, 毕秋灵. 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和分析. 人口研究, 2007, 31 (2):30-40.

张文娟. 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以北京市为例.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 (6):88-92.

周敏, 黎相宜. 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 东南亚研究, 2012 (6):56-62.

Agarwal, R, Horowitz, A. W. Are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Altruism or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Guyana Using Multiple-Migrant Households, *World Development*, 2002, 30(11): 2033-2044

Ahlburg, D. A, R. P. C. Brown. Migrants' Intentions to Return Home and Capital Transfers: A study of Tongans and Samoans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35(2):125-151.

Amuedo-Dorantes, C, Pozo, S. Remittances as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Mexican Immigrant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6, 19(2): 227-254.

Banerjee, B. The Probability, Size and Uses of Remittances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4, 16(3):293-311

Blue, S. State Policy, Economic Crisis, Gender and Family Ties: Determinants of Family Remittances to Cuba. *Economic Geography*, 2004, 80(1): 63-82.

Bracking, S. Sending Money Home: Are Remittance always Beneficial to Those Who Stay Behin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3, 15(5): 633-644.

Cox, D. Motives for Private Transf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 95(3): 508-546.

Du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Funkhouser, E. Remittances fro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omparison of El Salvador and Nicaragua.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5, 77(1):137-146.

Hoddinott, J. Modelling Remittance Flows in Kenya.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cs*, 1992, 1 (2) 206-232.

Jorge Durand, Emilio A. Parrado, Douglas S. Massey. *Migradollars and Development: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exican Ca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6, 30(2):

423-444.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1936.

Leland. H. E.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82): 465-473.

Lucas. R. E. B, Stark. O.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5): 901-918.

Michael. J. Piore.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Modigliani. F, Brumer.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388-436.

Poirine B. *A Theory of Remittances as an Implicit Family Loan Arrange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97, 25(5):589-611.

Qian Cai. *Migrant Remittances and Family Ties: A Case Stud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3, 9(6):471-483.

Rapoport. H, Docquier. F. *The Economics of Migrants' Remittances*.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05, 2:1531-1198.

Schrieder. G, Knerr. B. *Labour Migration as a Social Security Mechanism for Smallholder Household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Case of Cameroon*.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28(2):223-236.

Thaler, Richard H. , and Hersh M. shefrin. 1981. "An Economic Theory of Self-Control.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392-410.

Zhu. Yu, Zhongmin Wu, Meiyan Wang, Yang Du , Fang Cai. *Do Migrants Really Save More?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Saving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